

韩国的超低生育水平及区域差异

金敏子 金亨锡

【摘要】1998年以来韩国的生育率一直处于超低水平。文章根据2000、2005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了时期孩次递进比及其构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总和生育率,分析了生育率的变化。总和生育率在2000~2010年总的变化不大,但其构成、尤其是初婚和一孩到二孩的时期递进比波动明显。2000年以前的生育率虽有明显地区差异,但较为稳定,2000年起差异开始增大,特别是初婚和二孩递进比的地区差异较大。妇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初婚递进比较低。2010年5岁以下儿童入托率较高的地区,有较高的二孩递进比。

【关键词】韩国 低生育水平 地区差异 时期孩次递进比 人口政策

【作者】金敏子 美国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金亨锡 韩国统计厅人口普查局,局长。

一、引言

人口学界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5为极低生育水平,低生育水平对未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和规模有重要影响,且生育率很难在相对短时期内回升(Kohler等,2002;McDonald,2006;Lutz等,2006)。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60年的6.0下降到1983年的更替水平2.1,接着继续下降到1998年的极低水平1.47。此后生育率一直在小幅波动中下降,2001年下降到超低水平(总和生育率低于1.3),2005年达到破纪录的低水平1.08。200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一直在超低水平徘徊(Statistics Korea,2013)。2003年韩国政府启动了旨在阻止并扭转生育率下降的政策和项目。第一个综合性5年计划 *Saeromaji Plan I* (2006~2010)和第二个5年计划 *Saeromaji Plan II* (2011~2015)包括一系列政策和项目,目标是2020年将总和生育率提升到1.6,同时推动社会环境建设,以期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中保证持续的经济的发展,保证无论年龄和性别,所有人都享有高质量的生活。这些政策与项目包括为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提供生育补偿,改善生殖健康服务,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环境,促进性别平等(Cho,2006;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Korea,2010)。本文所用家庭政策和项目统称这些计划中的政府项目。

尽管韩国地域紧凑、地区间差距不大,但在生育水平方面一向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Eun,1997)。2010年省级总和生育率的分布从首尔市的1.01到西南农业地区忠南省

(Jeonnam)的 1.54(Statistics Korea, 2013)。形成差距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经济条件差距及家庭政策和项目实施方面的不同。此外,韩国中央政府提出家庭政策和项目的指导意见,由各地政府负责实施,因而地区之间会有所不同。

本文将分析 2000~2010 年韩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这一时期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在 1.47~1.08 之间波动。我们还将分析生育率差异与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和家庭政策与项目实施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后,本研究结果可用于分析现行家庭政策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此外,考虑到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本研究结果还可为未来家庭政策取向提供依据。

二、韩国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变化

(一) 1960~2010 年韩国生育水平变化的回顾

本文使用两种总和生育率。一是根据年龄别生育率估算的传统的总和生育率,记为 TFR_{asfr} ,数据基本来自人口统计。另一种是根据时期孩次递进比计算的总和生育率 TFR_{pppr} ,应用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计算。孩次指妇女曾经生育的孩子数量,孩次递进比是妇女生下一个孩子的比例,即从当前孩次递进到下个孩次的比例。本文应用的孩次递进比是时期指标,而非队列指标,即考虑年内观察到的妇女生第一个孩子($PPPR1$)、生第二个孩子($PPPR2$)、直至最高孩次的孩次递进。韩国的婚前生育极少,可忽略不计(Statistics Korea, 2013),假设先递进到初婚,然后再递进到生一孩也是合理的。因而可将 $PPPR1$ 拆分为从妇女本人出生递进到初婚($PPPRBM$)、再从初婚递进到初育($PPPRM1$)两部分。时期总和生育率 TFR_{pppr} 即可从所有递进比估算。 TFR_{asfr} 一般不会与 TFR_{pppr} 完全相同,因为 TFR_{asfr} 是从只考虑年龄但未考虑孩次及其间隔的生命表估算的,而 TFR_{pppr} 未考虑年龄但考虑了孩次和间隔。

我们应用 1970、1980、1990、2000 年的普查数据,估算了普查前 10 年的 TFR_{pppr} ;应用 2005 年和 2010 年的普查数据,估算了普查前 5 年的 TFR_{pppr} 。韩国的生育率变化可分为 3 个阶段(见图 1)。第一阶段为 1960~1983 年,是生育率从高水平向更替水平急速下降时期。韩国生育率在这个阶段的下降,是快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与国家有效的计划生育项目共同作用的结果(Cho 等,1982;Choe 等,2006;Kim,1987;Kwon,1993)。第二阶段为 1983~2005 年,韩国生育率在此期间下降到 TFR_{asfr} 1.08 的最低水平。这个阶段的国家计划生育项目,将倡导少生、减少非意愿生育的目标,调整为改善生殖健康服务质量、倡导健康家庭。2005 年以后为第三阶段, TFR_{asfr} 和 TFR_{pppr} 在此期间略有提升。2006 年开始实施的 *Saeromaji* 计划,旨在向妇女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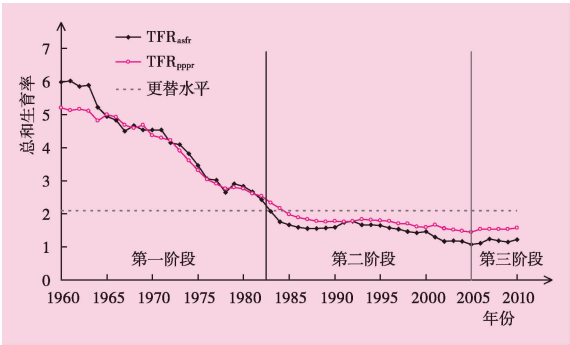


图 1 1960~2010 年韩国的 TFR_{asfr} 和 TFR_{ppp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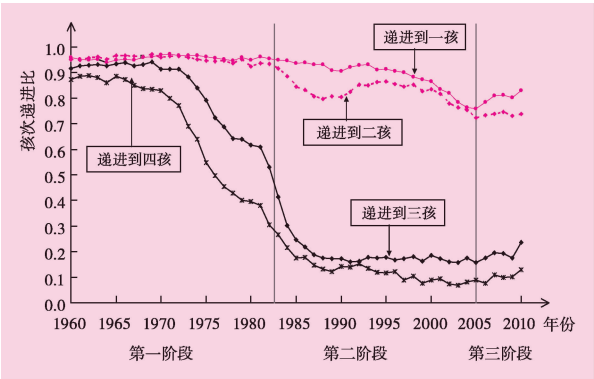


图2 韩国孩次递进比在3个阶段中的变化

助她们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Cho,2006)。

图2为1960~2010年3个阶段的孩次递进比变化。时期孩次递进比在生育率下降的3个阶段显示出不同模式。生育率下降的第一阶段 PPPR3 和 PPPR4 急剧下降,PPPR3 从 0.92 下降到 0.41,PPPR4 从 0.87 下降到 0.27。而 PPPR1 和 PPPR2 几乎不变,前者一直在 0.95 及以上,后者仅从 0.95 下降到 0.92。第二阶段 PPPR3 和 PPPR4 逐渐降低到极低水平,分别降至 0.18 和 0.12。此外,PPPR2 在波动中下降,PPPR1 开始有明显下降。二孩递进比 PPPR2 在此阶段的大部分年份都在 0.85 以上波动,不过在 1987~1990 年间低于 0.85。这些波动主要受国家计划生育项目的影响,在项目放宽松之后有一段短期的力度增强(Choe 等,2006)。初育递进在此阶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1983 年的 PPPR1 为 0.95,即 95% 的妇女终身至少生育过一个孩子。2003 年的 PPPR1 下降到 0.75,2004 年为 0.76。长此以往,将会有约 1/4 的妇女终身无孩。换言之,这个阶段的生育模式变化显示了无孩妇女有明显的上升。第三阶段的特点是总和生育率在 2005 年后略有回升,PPPR2 趋于稳定,PPPR1 略有上升。从 PPPR1 反映出来的无孩妇女比例从 2003 年的 25% 下降到 2010 年的 17%。

(二) 1980~2010 年韩国社会经济的变化

1960 年以来,韩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1980 年以后社会变迁速度加快。表 1 列出了 1980~2010 年韩国部分经济社会指标,与生育率变化的第二、三阶段相对应。这段时期的人均 GDP 从 1980 年的 1 660 美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20 562 美元(按 2010 年美元价格),城市居民比例从 1980 年的 57% 上升到 2010 年的 83%。最令人瞩目的是妇女受教育

程度的改善,高中入学率在 30 年间从 44% 上升到 92%,高中毕业女生升入高校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32% 上升到 2010 年的 81%。相对于经济和教育的巨大变化,劳动年龄(15~59 岁)妇女的劳动参与变化不大,1980 年妇女参与劳动比例为 43%,2010 年为 49%。私有车辆和手机数量的急剧上升意味着人际交往更为频繁,也意

表 1 1980~2010 年韩国部分社会经济指标

指 标	年 份			
	1980	1990	2000	2010
人均 GDP (2010 年美元价格)	1660	1303	11292	20562
城市人口比例(%)	57	74	80	83
女性高中入学率(%)	44	77	89	92
高中毕业女生的高校升学率(%)	—	32	68	81
女性劳动参与率(%)	43	47	49	49
每百户私车拥有量(辆)	—	17	54	76
每千人手机拥有量(部)	—	2	570	1027

注:“—”表示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Statistics Korea, Various Years, Social Indicators of Korea。

味着态度和行为改变的扩散速度更快。

尽管妇女的劳动参与水平在 30 年间没有显著变化,但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初婚和生育年龄的推迟等,妇女劳动参与的年龄模式发生了改变。图 3 为妇女在 1990~2010 年的年龄别劳动参与率。1990 年以后,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妇女比例上升,20~24 岁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急剧下降。1990~2010 年,25~29 岁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明显持续上升,主要是由于持续的经济发展为年轻未婚并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创造了不断增长的就业机会,以及初婚和初育年龄的推迟。劳动参与水平最低的年龄段从 1990 年的 25~29 岁推迟到 2000 年的 30~34 岁,2010 年进一步推迟到 35~39 岁。这是初婚和初育年龄推迟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社会经济变化中,韩国妇女的劳动参与模式一直保持“M”形,尽管在最低和最高年龄的参与水平有所变化,但总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生育高峰年龄退出劳动力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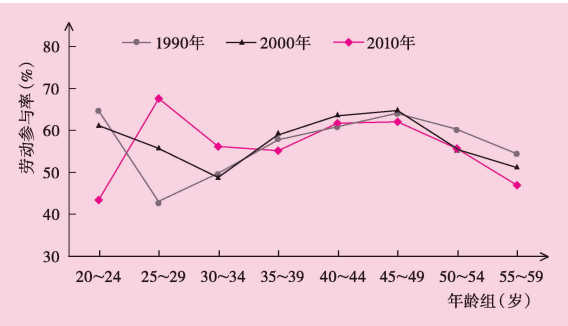


图 3 1990~2010 年韩国年龄别妇女劳动参与率

三、韩国生育水平的变化与地区差异

(一) 分析方法

在分析生育率的区域差异时,我们主要应用时期孩次递进总和生育率 TFR_{pppr} 描述婚育行为,总和生育率的计算包括了所有孩次递进。这些生育指标的估算都应用 2000、2005 和 2010 年普查的微观数据。普查数据是按住户登记个人信息的,我们首先应用 Luther 发明的生育史重构法(Luther 等,1988;Luther 等,1990;Retherford 等,1996)构建所有 15~60 岁妇女的生育史。基本计算步骤为:首先,筛查所有 15~60 岁妇女的家庭成员记录,找出其子女;母子匹配的关键变量是年龄及其与户主的关系。但用这种方法构建的妇女生育史可能不完整。其次,检查妇女自报的曾生子女数是否大于母子匹配得到的子女数。如果有子女缺失,则应用妇女曾生子女数和从近年生育年龄模型推算的年龄别出生概率(根据已匹配子女调整)来补齐生育史(关于更多技术细节,可参阅 Choe 等,2009)。构建生育史后,再应用妇女出生年、初婚年和各孩次生育年份,估算时期递进比。这些递进比依次是:从妇女出生到初婚(PPPRBM),从初婚到初育(PPPRM1),从初育到生二孩(PPPR2),从二孩到生三孩(PPPR3)等。根据各地的假想时期生命表以此类推。PPPRBM 递进的生命表在 40 岁截止,更高次递进的生命表在孩次间隔 10 年截止。根据所有孩次的时期递进比,我们估算了各地的时期总和生育率 TFR_{pppr} 。由于该指标的计算不涉及妇女年龄,所以初育年龄推迟对该指标的影响要小于 TFR_{asfr} 。因此,如果某年初育年龄推迟,则当年的 TFR_{pppr} 会略高于 TFR_{asfr} ,如图 1 中生育率下降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韩国的主要行政区划包括 1 个特大都市(首尔,皆为城区),

2个全部为城区的大城市,4个分城乡的扩展大城市,9个分城乡的省。我们将这29个地区作为分析单位,应用2005年普查时的当地15~49岁妇女在全国同龄妇女中占比进行加权。

(二) 1995~2010年韩国生育水平的变化

1995~2010年韩国 TFR_{adj} 在1.08~1.47之间波动,这段时间不同年龄组的生育行为发生了变化。图4显示了根据人口统计估算的20~24岁、25~29岁、30~34岁和35~39岁组的年龄别生育率模式变化。25~29岁组妇女的生育率持续下降,30~34岁组的生育率在2000~2005年基本保持不变,2005年以后呈小幅度稳步上升。2005年以前生育率最高的是25~29岁组,此后则是30~34岁组。20~24岁组的生育率走向与25~29岁组相似,但水平低得多。35~39岁组的生育率变化也与30~34岁组相似,且生育水平相对更低。20岁以下和39岁以上的年龄别生育率极低,可忽略不计。

图2显示,1995~2010年 TFR_{PPW} 的主要构成是PPPR1和PPPR2。1995~2005年PPPR1和PPPR2明显下降,此后PPPR1有小幅回升,但PPPR2保持不变。根据1995年和2005年的生育模式,PPPR1下降意味着终身无孩妇女将从9%上升到24%。由于韩国非婚生育水平一直都很低,占总生育比例不到2%(Statistics Korea, 2013),可将PPPR1分解为PPPRBM(已婚比例)和PPPRM1(已婚妇女中有孩比例)。图5显示了韩国妇女曾婚比例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未婚妇女比例从1995年的7%急剧增加到2005年的18%。而与此同时,已婚妇女

无孩比例仅有小幅增加,从1995年的2%上升到2005年的6%。2006年被认为是结婚的吉祥年,因而PPPRBM有个小凸起(2006年正逢农历闰年,共有13个月,并有两“立春”)。

2005~2010年,PPPR1有小幅上升,这主要是由于PPPRM1的小幅上升或已婚妇女无孩比例从6%到1%的下降。PPPR1和PPPR2两个指标的变化反映了二孩及以上妇女比例的下降,从1995年的79%下降到2005年的55%,此后在2010年又略微上升到61%。此外,1995~2010年,初育年龄也发生了变化(见图6)。平均初婚年龄的计算是用于推导时期初婚递进比的生命表的一部分,因而是假想时期指标,且不同于常用的SMAM(根据普查时未婚比例估算的平均初婚年龄)。从图6可以看出,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的变化趋势相同,反映了初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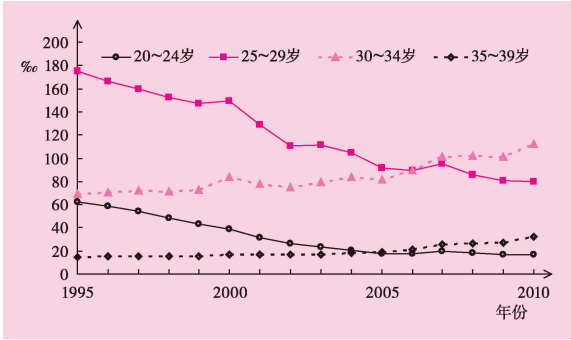


图4 1995~2010年韩国应用人口统计估算的年龄别生育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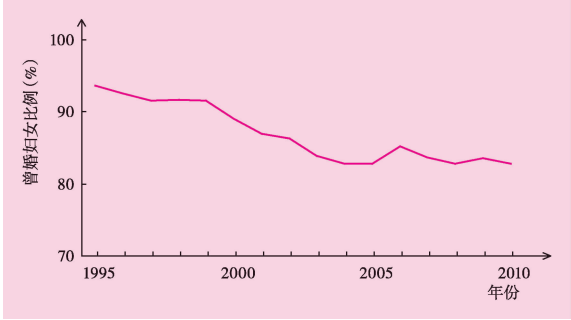


图5 1995~2010年韩国曾婚妇女比例的变化

初育间隔基本不变;只是在 2010 年初育平均年龄略有下降,而初婚平均年龄不变。如图 1 所示,初婚年龄的持续推迟导致持续推迟生育,因而导致 TFR_{asfr} 降低。

(三) 韩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

韩国的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都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曾有研究指出韩国总和生育率 TFR_{asfr} 的地区差异(Eun,1997)。 TFR_{pppr} 及其主要构成的地区差异在 2000 年以前基本稳定(数据未列出),但 2000 年以来差异呈增大的趋势。因而,我们主要分析 2000 年以后的情况。表 2 和表 3 显示了 TFR_{pppr} 及其主要构成 PPPRBM、PPPRM1、PPPR2、PPPR3 的差异。表 2 显示,在所有 3 个年份中, TFR_{pppr}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都在 0.6 以上。这个差距相当大,并与此前研究所发现的 TFR_{asfr} 差距一致。由于最大值有所降低,致使该差距逐渐缩小。

表 3 显示, TFR_{pppr} 中各孩次的差异及变化较为复杂。初婚递进比或估计的已婚比例差异最大。已婚比例的最大值在 3 个普查年份均接近 100%,即有些地区绝大多数妇女最终都会结婚。而最小值从 2000 年的 83%下降到 2010 年的 75%,各年份的最小值都发生在首尔。因为最大值基本不变,而最小值下降显著,极差则从 2000 年的 13 个百分点增长到 2010 年的 23 个百分点。显然初婚及随后初育的递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TFR_{pppr} 的变化。

从初婚到初育的递进比在 3 个普查年份都很高,地区差异很小。换言之,几乎所有已婚妇女都至少生一个孩子,且直至 2010 年这种模式没有改变。而一孩向二孩的递进变化则值得注意。该递进比的最小值相当低,3 个普查年份都在 70% 及以下,最大值则远未达到普遍生二孩的水平。二孩递进比的极差较大,仅在 2010 年略有缩小。值得注意的是,这 10 年中已婚比例的差距逐渐拉大,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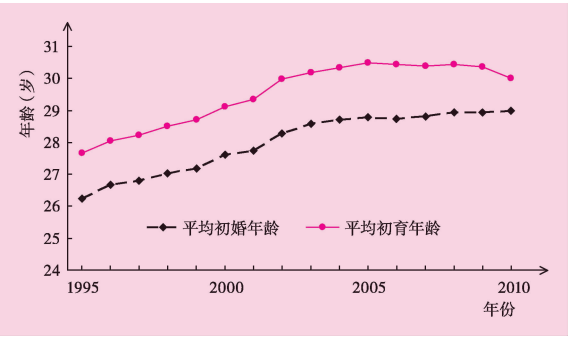


图 6 1995~2010 年韩国初婚和初育平均年龄的变化

表 2 不同年份韩国 TFR_{pppr} 的地区差异

普查年份	最小值	最大值	极差
2000	1.57	2.21	0.64
2005	1.22	1.84	0.62
2010	1.44	2.05	0.61

注:根据 2000、2005 和 2010 年韩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估算。

表 3 时期孩次递进比的地区差异 %

普查年份	最小值	最大值	极差	普查年份	最小值	最大值	极差
已婚比例				递进到二孩比例			
2000	83	96	13	2000	70	93	23
2005	73	95	22	2005	64	84	20
2010	75	98	23	2010	69	88	19
已婚有一孩比例				递进到三孩比例			
2000	95	99	4	2000	14	44	30
2005	89	97	8	2005	12	38	26
2010	94	100	6	2010	13	52	39

注:同表 2。

孩递进比的差距缩小了。这两部分向相反方向的变化可能导致 TFR_{pppr} 地区差异几乎不变。从二孩向三孩的递进比极差上下波动,但该递进比较小,不会对 TFR_{pppr} 有显著影响。

(四) 地区生育水平差异的相关因素分析

近年来,有关东亚低生育率国家的研究发现,妇女非农就业、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困难程度、妇女有关性别角色的态度等,都是影响生育的关键因素(Bumpass 等,2009;Choe,2006;Choe 等,2006;Jones,2007)。这些因素以不同方式影响家庭组建进程的各个阶段。例如,妇女对性别角色的态度更可能影响初婚和初育,而对更高孩次的影响相对较弱;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则对二孩和更高孩次有更大影响。妇女的非农就业对每个阶段都有影响。因为分析单位是地区,样本量较小,我们仅选择 4 个解释变量,分析它们对 2000、2005、2010 年地区各生育指标差异的影响。这 4 个解释变量是:城市化、妇女就业结构、妇女受教育水平、托儿设施使用率(以下简称入托率)。在低生育水平下,这 4 个变量应足以解释主要原因。我们估算了每个普查年度的 PPPRBM、PPPRM1、PPPR2、PPPR3,以 TFR_{pppr} 作为回归分析的因变量。由于不同地区的人口规模相差较大,回归中应用 15~49 岁妇女规模加权。

城市化和妇女受教育水平与妇女的性别角色态度密切相关。我们将城市化程度分为大都市、其他城市、农村三类。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指标定义为 30~34 岁妇女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就业结构指标为 40~44 岁妇女的非农就业比例。妇女在考虑结婚和生育时,主要问题是生育后的就业机会。在妇女非农就业比例相当高的地区,即使妇女因婚育暂时退出就业,她们对重返劳动力市场会持积极态度,而这种积极态度也可能与较高的生育水平相关。我们在分析中没有纳入 40 岁以下妇女的就业状况,因为她们的劳动参与受生育行为的影响。

我们尝试使用当地托儿服务的利用情况代表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困难程度,具体指标是普查年份 5 岁以下儿童入托率。家庭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提供足够的托儿服务,我们用实际使用该服务的信息来测量家庭政策的有效实施。

从表 4 可以看出,2000~2005 年所有生育指标均下降。2005~2010 年 PPPRM1 和 PPPR3 有所回升,但 PPPRBM 和 PPPR2 基本不变。这些波动导致 TFR_{pppr} 在 2005~2010 年小幅回升。受过高等教育的 30~34 岁妇女的平均比例在 10 年中几乎翻番,从 2000 年的 36%升至 2010 年的 68%。同期 40~44 岁非农就业妇女的平均比例从 44%升

表 4 回归分析中所用变量的加权平均值

变 量	普查年份		
	2000	2005	2010
时期递进比			
出生至初婚(PPPRBM)	0.90	0.84	0.85
初婚到初育(PPPRM1)	0.98	0.95	0.99
初育到二孩(PPPR2)	0.83	0.73	0.74
二孩到三孩(PPPR3)	0.20	0.17	0.22
总和生育率 TFR_{pppr}	1.77	1.45	1.65
地区城市化水平			
大都市	0.68	0.68	0.68
其他城市	0.18	0.18	0.18
农村(参照组)	0.14	0.14	0.14
30~34 岁妇女受过高等教育比例	0.36	0.50	0.68
40~44 岁妇女非农就业比例	0.44	0.47	0.60
5 岁以下儿童入托率	0.12	0.11	0.29

注:根据 2000、2005 和 2010 年普查的微观数据估算。

至 60%。5 岁以下儿童的入托率在 2000~2005 年间变化不大,但 2005~2010 年增长了 1.6 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2006 年开始实施的 *Saeromaji* 计划。

(五) 回归分析结果

表 5 为回归分析结果。城市化对某些孩次递进有微弱作用,但与总生育水平不相关。妇女受教育程度在 3 个普查年份都与初婚递进高度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递进越低,近年的相关程度更高。受教育程度在 2000 和 2010 年也和二孩递进相关,但在 2005 年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2005 年的教育变量对一孩和二孩递进作用不显著,但对三孩递进有显著正向作用。当时生育率处在最低水平,而在受高等教育妇女比例较高的地区,妇女更有可能生两个以上的孩子,不过总的来说生多孩的比例很小。妇女的就业结构在 2000 和 2005 年仅对三孩递进略有影响。较高的非农就业比例与生三孩的可能性负相关,但该相关关系在 2005 年较弱,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入托率在 2010 年与二孩和三孩递进高度正相关,但在 2000 和 2005 年仅有微弱的混合效应,且只对三孩递进有影响。2010 年的入托率和

表 5 解释变量对时期孩次递进和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变 量	递进至初婚 (PPPRBM)	初婚至初育 (PPPRM1)	初育至二孩 (PPPR2)	二孩至三孩 (PPPR3)	总和生育率 TFR_{pppr}
2000 年					
大都市(参照组:农村)	0.02	-0.01	0.02	-0.01	0.03
其他城市(参照组:农村)	0.05**	0.01	0.03	0.01	0.08
妇女高等教育比例	-0.39**	0.01	-0.28*	-0.24	-1.40**
妇女就业	-0.12	-0.01	-0.15	-0.83**	-1.07
入托率	-0.40	-0.10	-0.11	0.82*	0.62
调整后的 R^2	0.63	0.24	0.20	0.64	0.64
2005 年					
大都市(参照组:农村)	0.02	-0.01**	-0.01	-0.12**	-0.10
其他城市(参照组:农村)	0.04	-0.00	0.01	-0.08**	0.02
妇女高等教育比例	-0.65**	0.02	-0.13	0.29**	-0.95**
妇女就业	0.02	0.03	-0.06	-0.47**	-0.52
入托率	-0.10	-0.09*	0.34	0.66**	0.17
调整后的 R^2	0.61	0.27	0.33	0.65	0.57
2010 年					
大都市(参照组:农村)	0.06*	-0.00	0.02	-0.03*	0.02
其他城市(参照组:农村)	0.07**	-0.00	0.03*	-0.05**	0.06
妇女高等教育比例	-0.77**	0.02	-0.23**	-0.13	-1.47**
妇女就业	-0.20	-0.01	-0.33*	0.07	-0.80
入托率	0.50*	-0.03	0.52**	0.61**	1.46**
调整后的 R^2	0.69	0.06	0.67	0.70	0.78

注:(1)表中所列为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分析单位为分城乡的地区($N=29$),地区 15~49 岁妇女人数为权重。(2)*、** 分别表示该系数统计显著水平在 10%、5%。(3) TFR_{pppr} 为孩次递进时期总和生育率。

TFR_{ppr} 之间显示了高度相关,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韩国总体上托儿服务仍很有限。2006 年实施家庭政策和项目以来,托儿服务设施逐渐增多,并且托儿服务利用上升与二孩和三孩妇女比例上升相关。调整后 R^2 的变化说明,回归中的解释变量对初婚递进、三孩递进和总和生育率有较强的解释力,而对已婚妇女的一孩递进则不然。2000~2010 年这组变量对二孩递进的解释力度逐渐增强。

四、总结与讨论

韩国生育水平下降迅速,且 1998 年以来一直保持在超低水平。2000~2010 年的时期总和生育率 TFR_{ppr} 基本不变,但其构成、尤其是一孩和二孩的时期递进比波动明显。尽管在 2000 年以前地区之间的生育率存在差异,但相对稳定,而 2000 年后差异增大。初婚、二孩和三孩递进的地区间差别较大,而已婚妇女的一孩递进则差别很小。尽管 TFR_{ppr} 的某些成分与地区城市化程度有弱相关,但城市化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没有显著统计相关。受过高等教育妇女比例在 2000、2005 和 2010 年 3 个普查年份都与初婚递进比显著相关,且在近年相关性增强。2000 和 2010 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比例与二孩递进比负相关,但在 2005 年不显著。总的来看,在所有年份妇女受教育程度都与 TFR_{ppr} 显著相关。

受教育程度高的妇女初婚递进比低,究竟是因为妇女的偏好,还是其他原因需要有更多研究。如果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妇女偏好不结婚,那么,哪些原因导致有这种偏好?最近一项对 20~44 岁未婚男性和女性的全国调查发现,不到 5% 的未婚男女偏好不结婚,在非正规就业和低收入人群中比例稍高(Kim 等,2012)。当问到没有结婚或晚婚的主要原因时,80% 以上男性和女性报告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稳定的工作”(Kim 等,2012:266)。此外,58% 的男性和 78% 的女性还选择了“没有准备好承担婚后的额外责任”作为未婚的理由之一。这些调查结果说明,如果年轻男女能有更多机会获得稳定工作、如果他们能处理好随婚姻而来的“额外责任”,有可能提升初婚递进和生育水平。未来家庭政策需要认真考虑这些因素。在 2005、2009 和 2012 年 3 次全国调查中,向 20~44 岁的妇女询问了她们偏好的子女数量和就业组合,调查对象选择最多的是两个子女和非全日制工作,其次是两个子女和全日制工作。2012 年的调查中有 59% 的妇女选择两个子女、非全日制工作或全日制工作(Kim 等,2012:176)。仅有 18% 的妇女选择不工作,有 23% 的妇女选择少于两个子女。20~44 岁未婚男性的调查结果与女性相似。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更多儿童利用托儿服务的地区,二孩递进比较高,但仅在 2010 年才显现很强的相关关系。这说明 2006 年开始的 *Saeromaji* 计划的家庭政策和项目在提高生育水平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越来越多托儿服务的开展,二孩和更高孩次递进比有可能上升,从而可能提高生育水平。但在帮助职业妇女实现意愿生育二孩方面,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未来家庭政策中,可能重要的是为已婚妇女提供薪水丰厚的非全日制工作,创造家庭友好型就业环境。

对于诸多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而言,以上分析仍有局限。在影响韩国的婚育行为方面,住

房价格、儿童教育成本、青年男女的就业环境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其差异是否影响结婚生育的地区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为此也更迫切需要收集相关数据。

参考文献:

1. Bumpass, Larry L. Ronald R. Rindfuss, Minja K. Choe, Noriko O. Tsuya (2009),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The Case of Japan.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5, No.3, pp.215-235.
2. Cho, Lee-Jay, Fred Arnold, and Tai-Hwan Kwon (1982), Th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3. Cho, Nam-Hoon (2006), New Challenges of Fertility and Family Policies in Korea.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Forum on Low Fertility and Ageing Societ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4. Choe, Minja Kim (2006), Modernization, Gender Roles and Marriage Behavior in South Korea. In *Transforma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Korea*. Yun-Shik Chang and Steven Hugh Lee eds. London: Routledge.
5. Choe, Minja Kim and Kyung-Ae Park (2006), Fertility Decline in South Korea: Forty Years of Policy-Behavior Dialogue. *Korea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Vol.29, No.2, pp.1-26.
6. Choe, Minja Kim and Robert D. Retherford (2009), The Contribution of Education to South Korea's Fertility Decline to 'Lowest-Low' Level.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5, No.3, pp.267-288.
7. Eun, Ki-Soo (1997), Fertility Differentials by Locality,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in Korean). In *Hanguk Ch'ulsanryŏk Pyŏnch'ŏn ūi Ihae (Understanding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Korea)*. Kwon Tai-Hwan et al. Seoul: Ilsinsa.
8.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Korea (2010), *Saeromaji Plan 2015: Plan for Ageing Society and Population*. 11-1352000-000082-01.
9. Jones, Gavin W. (2007), Delayed Marriage and Very Low Fertility in Pacific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33, No.1, pp.31-42.
10. Kim, Doo-Sub (1987), *Socioeconomic Status, Inequality, and Fertility*. Seoul: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er,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11. Kim, Seung-Kwon, Y.-K. Kim, H.-R. Kim, C.-S. Park, C.-K. Son, Y.J. Choe, Y.W. Kim, G.-E. Yi, and A.-R. Yun (2012), 2012 National Survey on Fertility, Family Health, and Welfare in Korea (in Korean). 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12. Kohler, Hans-Peter, Francesco C. Billari, and José Antonio Ortega (2002), The Emergence of Lowest-Low Fertility in Europe During the 1990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28, No.4, pp.641-680.
13. Kwon, Tai-Hwan (1993), Exploring Socio-Cultural Explanation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Korea. In Leete and Alam (eds.) *The Revolution in Asian Ferti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4. Luther, Norman Y. and Lee-Jay Cho (1988), Reconstruction of Birth Histories from Census and Household Survey Data. *Population Studies*. Vol.42, No.3, pp.451-472.
15. Luther, Norman Y., Griffith Feeney, and Weimin Zhang (1990), One-Child Families or a Baby Boom? Evidence from China's 1987 One-per-Hundred Survey. *Population Studies*. Vol.44, No.2, pp.341-357.
16. Lutz, Wolfgang, Vegard Skirbekk, and Maria R. Testa (2006), The Low-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67-192.
17. McDonald, Peter (2006), Low Fertility and the State: The Efficacy of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32, No.2, pp.485-510.

18. Retherford, R.D., and N.Y. Luther(1996), Are Fertility Differentials by Education Converg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Genus*. Vol.52, No.3-4, pp.13-37.
19. Statistics Korea(2013), *Birth Statistics of Korea, 2012*. Daejeon, Korea; Statistics Korea.
20. Statistics Korea(Various years). *Social Indicators in Korea, 2012*. Daejeon, Korea; Statistics Korea.

译后记

韩国生育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生育率的变化过程与中国极其相似,只不过在时间上比中国早10年。尽管中国生育率的发展进程和地区差别不会直接复制韩国的模式,但此文对韩国近10年生育率变化、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仍对估计中国未来10年生育率变化趋势有重要启示意义。当妇女终身生育数量已经减少到1~2个孩子时,婚育时间将会显著影响时期生育率。而显然有利于妇女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政策与社会环境将是影响二孩生育的重要因素。

其一,初婚时间的变化仍将是时期生育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过去20年来,中国妇女的初婚年龄推迟已经对时期生育率产生了显著的进度效应,但这种效应远未结束。虽然有学者根据“六普”数据分析认为,时期生育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农村未流动妇女推迟初婚年龄的影响,但随着更多青年接受大专以上教育、更多青年在城市就业,同时大学生就业竞争仍然激烈,城市青年群体有可能再次成为下一轮推迟初婚的主力。而对于30岁以上未婚群体,虽然当前比例不大,但其发展趋势及其对未来生育水平的影响,仍不容忽视。

其二,受教育程度仍然是影响妇女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高生育水平时代教育的作用是降低妇女生育意愿、提升妇女生育决策自主性、促进妇女使用现代避孕方法。在低生育水平下,受教育程度已成为直接或间接抑制生育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校时间的延长直接导致妇女初婚时间的推迟,一般在校青年结婚的比例较低;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女性,往往在求职上有更高的期望,加入了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也会推迟初婚时间。韩国2000~2010年初婚递进的影响因素分析显示了这种效应。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往往更容易从事非农全职工作,这种工作环境和氛围不仅会抑制二孩生育愿望,也会推迟二孩生育时间,在中国还会推迟一孩生育。

其三,合适的政策将会发挥积极作用。韩国并不是第一个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许多低生育国家都有各种旨在提高生育率的相关政策。但不少有关政策效果的研究结果却并不乐观。例如,仅依靠对生育多孩的现金补助政策,效果甚微。而对韩国2010年时期孩次递进的分析发现,地区儿童入托情况与二孩和三孩递进有显著相关。这一事实带来的希望是,如果有合适的公共政策和友好的社会、社区、家庭环境,使妇女兼顾事业和家庭的需求得到满足,将有可能使大部分妇女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大多为两个孩子),从而有效提升生育率。不过,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韩国托儿服务总体上还比较有限,需要进一步发展,也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译者:郑真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 犁)